

吴格言·著

敦煌归义军文学研究



蓝天出版社
BLUE SKY PUBLISHING

吴格言
著

敦煌归义军文学研究



蓝天出版社
Blue Sk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归义军文学研究/吴格言著.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11.6

ISBN 978 - 7 - 5094 - 0604 - 5

I. ①敦…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6020 号

责任编辑: 薛虹

封面设计: 富连成社视觉

出版发行: 蓝天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14号

邮编: 100843

电话: (010) 6698341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77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定 价: 35.00元

前 言

敦煌归义军文学是唐末五代敦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但在目前敦煌文学研究领域还是有待填补的空白。本书研究的是张氏归义军时期（851—914）敦煌地方的文学活动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同时对研究社会转型期文学与政治、军事的关系以及宋初文学也很有价值。

本书把创作或传抄于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文学文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置之于唐末五代中原——敦煌社会生活的宏观背景之下，运用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结合敦煌历史、宗教、艺术、民俗、语言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条分缕析，深入挖掘，指出归义军文学与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艺术、风俗等或隐或显的内在联系，澄清并揭示出归义军文学活动的具体史实及其发展过程，并针对原创作品与传抄作品的不同特性，分别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就具体作品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

“敦煌”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学是作家以审美的方式，运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敦煌文学是唐末五代敦煌人民创作或欣赏并因此

以写卷或其他形式保存在本地区的文学作品。归义军文学在敦煌文学历史上最为兴盛也最具特色，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

源远流长、深厚坚实的地域文化是归义军文学重要的文化基础。从五凉到吐蕃占领时期（317—848），敦煌文学在不同发展历史阶段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其现实主义传统对后来曹氏执政时期（914—1002）的归义军文学影响深刻。曹氏时期，敦煌文学活动接受大过原创，故暂不列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

农业、畜牧业、工商业等传统的生产方式不仅是归义军文学的物质基础，更内在地影响到归义军文学的题材主题和思想感情。归义军政权和中央政府、及其内部不同世家大族、节度使衙门和都僧统司之间时而融洽时而冲突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敦煌地方政局的变化，而且明显影响到归义军文学的发展演变。宗教艺术、乡规族约、婚丧礼仪和民间风俗为归义军文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从多方面深刻影响着归义军文学的发展。

根据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本书把归义军文学分为张议潮时期（851—867）、张淮深时期（867—890）、张承奉时期（894—914）几个阶段分别加以叙述。

归义军文学伴随沙州起义而产生，以悟真为代表的敦煌文人多围绕河西光复这一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进行创作，为唐宣宗和张议潮歌功颂德，抒发重归大唐的喜悦自豪之情，所用体裁有诗、词、变文、俚曲等，取材典型，描写生动，特别是铺张渲染所表现出的巨大张力，是归义军政权开拓进取、蒸蒸日上

上的艺术反映。

张淮深执政时期，与中原地区的持续战乱相比，敦煌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和平，归义军文学继续得到良好的发展，题材和体裁都更加丰富多样。其中，张淮深题材作品可以称为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的“诗史”。在张淮鼎、索勋执政时期（890—894），归义军政权内部斗争激烈，节度使更迭频繁，政治环境险象丛生，这些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随着唐朝中央政权的灭亡，敦煌地方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演变，张承奉在执政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唐朝归义军节度使（894—906）、西汉金山国（906—911）和西汉燉煌国（911—914）三个相互承接又相对独立的阶段。张忠贤、杜太初、张永、张文彻创作的《葬录序》、《白鹰诗二首并序》、《白雀歌》、《龙泉神剑歌》、《李陵苏武往还书》等作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归义军内外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过程。

与同一历史时期其他地方文学相比，归义军文学始终关注着地方政权和普通民众的生存命运这一重大主题，具体表现在反映现实政治、英雄人物、民族关系、史地风物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即使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对现实人生极大的热情与关怀，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敦煌社会生活、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敦煌作者在继承和运用民族传统文学体裁进行艺术创造和再创造的同时，大胆借用外地乃至外国文学中某些积极合理的因素，或者改造民间艺术形式以为己用，在艺术上以通俗平实、朴素自然为主要特征和审美追求。有些作品由于佛教的影响，也不乏大胆夸张的浪漫想象。

敦煌归义军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但在思想、艺术影响后世文学方面，则远远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局限。

吴格言

2011年5月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缅怀著名敦煌学家张锡厚先生

2005年7月13日下午5点，张锡厚先生走了，永远地走了。

他走得那么匆忙，以至于自己都没有思想准备……

6月份，张先生在美国探亲时，咳嗽得厉害，一检查，竟是肺癌晚期。

在此之前，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除了血压略高以外，什么病也没有……

7月3日，张先生回到学习、工作和生活了近50年的北京。

一下飞机，他就被直接送到了北京医院急救室。

在医院里，他努力吃饭，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他和学生谈到没有完成的课题。

他有太多的事情正在做、等待做……

然而，他还是走了。

他甚至没有看到已经完成、即将出版的《全敦煌诗》——那凝聚着他毕生研究心血的皇皇巨著……

1937年，张锡厚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新沂市。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新闻学专业。1960年9月，又入中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生班学习，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刘知几的文学批评》。1963年12月，张锡厚先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张锡厚先生开始的研究方向是唐诗。除去“十年动乱”没有科研环境之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间，他撰写了许多关于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韦庄、刘邺等人的学术论文，参与了《唐诗选注》、《唐代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敦煌文学概论》等大型集体科研项目的工作。

1978年，是中国科学工作的春天，也是张锡厚先生研究方向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著名敦煌学家任二北（半塘）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邀请，担任特邀研究员，从四川来到北京，对敦煌歌辞进行全面的普查、编辑和审订，为编著《敦煌歌辞总集》做准备。文学所副所长余冠英先生安排张锡厚先生做任先生的助手，协助任先生借还图书、查阅资料和日常生活。

在余先生的家宴上，任先生对张先生说：“你不要把协助我工作看成是为我服务，我也不能要求你那样做。我们在普查敦煌歌辞的同时，你也要有一个题目。我发现，敦煌写卷中，王梵志诗比较多，也很有意思，前人没有系统整理过。你如果愿意整理王梵志诗，我也可以帮助你。两年以后，我们都有成果出来。不然，你也无法向余先生交代。”

从此，张先生每天上午陪任先生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

书馆)检索缩微胶卷,核对遗书原卷,两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就这样,张锡厚先生步入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先后完成《敦煌文学》和《王梵志诗校辑》两部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1979年,张锡厚先生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撰写《敦煌文学》,作为“古典文学知识丛书”之一,于1980年5月出版。张先生在研究敦煌文学过程中,从一开始就站在理论高度看问题,首先为“敦煌文学”正名:“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的作品很多,很复杂,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都是来自民间的文学作品,主要有歌辞、变文、诗歌、话本小说、俗赋等文学样式,这就是敦煌文学要研讨的范围和对象”,“敦煌文学在形式和体制上有别于封建正统文学,基本上是通俗的民间文学,虽然其中也夹杂有某些经过文人加工润色的作品,但是它的作者大多是无名的市井小民、和尚道士以及民间艺人。”从此,“敦煌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专有名称,取代了此前流行已久的“敦煌俗文学”的概念,并被广大研究者所采用。

《敦煌文学》虽然以通俗读物的面貌出现,但在实际上精要地总结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成果,起到了“中国敦煌文学研究简史”的作用。

王梵志是隋至唐初著名的通俗诗人,但是,从元代以来,长期湮没无闻。直到敦煌遗书发现后,他创作的300多首五言通俗诗才引起国内外敦煌学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张锡厚先生从28种敦煌写本中钩沉发隐,根据原卷编次顺序,对336首(不包括附录的12首)王梵志诗进行分首、

标题、编号、点校和考订，校其异同，考释唐人俗语和佛教用语，第一次将王梵志诗辑录成《王梵志诗校辑》，是当时最完整、最丰富的辑录本。由此，他还考证、总结出王梵志的生活时代、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揭开了《桂苑丛谈》和《太平广记》关于王梵志怪诞不经的记载的神秘面纱，指出王梵志诗“且言时事，不浪虚谈”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不守经典，皆陈俗语”、寓奇崛跌宕于戏谑揶揄的艺术风格，为唐初诗坛带来的清新质朴的民间气息和对后世通俗诗歌发展的深远影响。

《王梵志诗校辑》引发了王梵志诗研究的热潮。张锡厚先生又将相关成果编成《王梵志诗研究汇录》，及时进行整理和总结，为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指引的便利。1999年，他又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撰写了《王梵志诗》，用通俗生动、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大学生和社会大众介绍王梵志其人其诗，使这位来自民间的诗人及其作品最终为人民大众所了解。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相当多的唐五代诗歌，特别是一些失传已久的作品。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学术界一直进行长期不懈的辑佚和研究。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对张锡厚先生来说，先前的唐诗研究为他研究敦煌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敦煌文学研究则丰富、深化了他对唐诗的研究。和前人注重辑佚、唐诗散篇不同，张锡厚先生对敦煌遗书中唐人诗文集的著录、源流、版本价值和文学价值，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后来结集为《敦煌本唐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隋末唐初大文学家王绩的研究。

王绩一生著述甚丰。死后，他的好友吕才编成五卷本《王无功文集》。中唐时，陆淳妄加删减为三卷本的《东皋子集略》。元代以后，五卷本罕见著录。1983年，张锡厚先生的《敦煌写本王绩集残卷考释》，将清同治四年陈氏晚晴轩抄《王无功集》五卷本、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同敦煌本进行校勘，对王重民先生在法国巴黎图书馆拍摄的P2819《东皋子集》残卷作了校补。以新发现的五卷本《王无功文集》为依据，张锡厚先生考证出王绩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对王绩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进行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王绩研究》。

张锡厚先生的《敦煌赋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对敦煌写卷中的赋作进行了全面的辑录和整理，共搜集46个卷号，去同存异，得27篇赋作，对每篇作品进行题解、校勘和训释。《前言》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敦煌遗书中唐人赋作的著录、作者、创作和抄写时代、选录标准等问题。《敦煌赋汇》展示了唐代敦煌地区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既弥补了唐人诗文集、总集的不足，也充实和丰富了中国赋史的研究。

2000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

为了纪念这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经过20多年的辛勤耕耘，张锡厚先生在全面总结自己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著成43万字的《敦煌文学源流》，系统探讨了敦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他从敦煌遗书保存的千余卷文学作品的实际出发，

认为，敦煌文学兼有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不可或缺又互为补充的重要方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与时俱进的不懈精神。他以大量材料为基础，追本溯源，探幽发微，提要钩玄，勘比异同，既有融汇，又有开掘，无不令人信服。该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书目，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于2000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张先生沉浸在敦煌文学研究的海洋里，身居闹市，心无旁骛，几十年如一日，老当益壮。敦煌文学已经成为他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精神支柱。他用学术报效国家，奉献社会。他的学术气魄越来越大。他和周绍良先生等人合作，查实、纠正和补充《全唐文》字句篇目的漏衍、作者误属及分合不当等问题，充分囊括近二百年来唐代佚文的搜集和整理成果，全部、准确、合理地纳入《全唐文》原文，进行全面彻底的校对和查重，编成《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使之名副其实地臻于完全和完善，推动全唐文研究走上科学的轨道。《全唐文新编》荣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

2002年3月，张锡厚先生退休。但是，他不但“退”而不“休”，反而比以前更忙了。他放不下敦煌遗书中那些珍贵的文学作品，决心全面整理、辑录敦煌遗书中的诗歌作品——从先秦到唐末五代。因为，即使对也见于中原的那些文学作品来说，敦煌写本也有着宝贵的版本价值。

这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

这个工程耗尽了他最后的岁月，燃尽了他生命的火烛。

他完成了，却没有看到。

张先生走了。认识他的人没有不感到震惊的，没有人不为之叹息和惋惜。

因为，他的身体非常好。他的厚道、诚恳、正直、助人，广为人知。

有人回忆道，以前，文学所有老先生生病住院，张先生总是陪床服侍，甚至献血，毫不犹豫……

去世前3个月，他还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邀请，专程前往，为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作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学术报告。

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只要别人需要，他总是那么慷慨大方，成人之美。

100年前，宝贵的敦煌文物被无知的王道士、贪婪的探险家、中饱的官僚一而再、再而三地劫掠、撕毁。幸有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学者前仆后继，焚膏继晷，殚精竭虑，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还原被践踏的敦煌文物。

张锡厚先生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敦煌；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

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也在中国。

张先生走了，留给我们蕴藏着丰富精神食粮的大山。

我们走进山中，看见满山的宝物，仿佛听见先贤教诲的声音……

吴格言

2005年9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敦煌文学与归义军文学	(1)
第一节 历来关于敦煌文学性质、范围和研究对象 的看法	(2)
第二节 “敦煌文学”一词的内在含义	(6)
第三节 “敦煌文学”一词的外延范围	(13)
第四节 敦煌文学与归义军文学	(16)
第二章 归义军文学的地域文化渊源	(21)
第一节 五凉时期的政教文艺	(21)
第二节 吐蕃占领之前的文学	(27)
第三节 吐蕃占领时期的文学	(44)
第三章 归义军文学的社会现实基础	(77)
第一节 敦煌社会的物质生产	(77)
第二节 敦煌社会的政权构成	(81)
第三节 敦煌社会的宗教与艺术	(87)
第四节 敦煌社会的风俗习惯	(92)
第四章 张议潮时期 (851—867) 的敦煌文学	(114)

第一节	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114)
第二节	史地风物题材作品	(125)
第三节	悟真前期的文学创作	(132)
第四节	时政题材的文学作品	(136)
第五节	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	(139)
第五章	张淮深时期 (867—890) 的敦煌文学	(143)
第一节	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143)
第二节	悟真后期的文学创作	(159)
第三节	时政题材的文学作品	(165)
第四节	张淮鼎、索勋时期 (890—894) 的文学	(180)
第六章	张承奉时期 (894—914) 的敦煌文学	(191)
第一节	归义军节度使时期 (894—906) 的文学	(191)
第二节	西汉金山国时期 (906—911) 的文学 ...	(203)
第三节	西汉燉煌国时期 (911—914) 的文学 ...	(223)
第七章	敦煌归义军文学的思想与艺术特征	(232)
第一节	敦煌归义军文学的思想特征	(232)
第二节	敦煌归义军文学的艺术特征	(238)
主要参考书目	(249)
后 记	(256)

第一章 敦煌文学与归义军文学

敦煌文学的性质、范围和研究对象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什么是敦煌文学以及敦煌文学研究敦煌遗书中哪些文学作品的问题。这一问题无疑是敦煌文学研究中一个必须直面的基本而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敦煌文学研究日后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

和敦煌文学研究中众多专题、作品研究的情况相比，关于敦煌文学的性质、范围和研究对象的讨论虽然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但是仍然显得薄弱和不够深入。

即以颜廷亮先生在《敦煌文学概论·导言》中下的“保存并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宋初的文学作品”^[1]这一定义而言，虽然已经得到许多敦煌文学研究者的认可和接受，但是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柴剑虹先生认为：“敦煌文学研究中诸多概念的‘模糊’，决定了由它们所组成的‘敦煌文学’也只能是一个模糊概念。其次，在敦煌文学的研究中，在涉及作品时代、作者、地域、体裁内容等许多重要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的疑问，这也决定了它的模糊性。”^[2]他批评前面所说的定义“似过于明确”^[3]并修改为“指保存或仅存于敦煌莫高窟的，以唐、五代、宋初写